

# 金砖银行创造合作共赢新契机

罗宁

过去两年,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作为“领头羊”的金砖国家似乎也在开始褪色,甚至被部分国际投行经济学家打上了“金光不再”、“昙花一现”的标签。但近日金砖国家在合作机制方面实现的重大突破,或将其走出困境创造新的契机。

## 金砖银行或成资金调控利器

本周在巴西举行的第六次金砖峰会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五国领导人签署了《福塔莱萨宣言》,宣布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根据协议安排,金砖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国均摊,最初认购额为500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同时设立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基金,中国出资41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其他三国各出资180亿美元。

从目前来看,金砖银行将在便利金砖国家之间的结算与贷款、帮助各国调剂外汇余缺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利于金砖国家减少对美元、欧元的依赖,更好地应对潜在的汇率危机或国际支付危机。此外,还能调剂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帮助各成员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融资支持。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措施逐步结束乃至下一步的加息,国际市场融资成本走高将是大概率。在此背景下金砖银行调剂资金余缺、控制融资成本的功能将得到更多的

体现,或将成为金砖国家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冲击的一大利器。

考虑到5个成员国内部的一系列相关程序,金砖银行正式运行可能还需花费不短的时间,但协议的签署预示着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经济合作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取得更多实质性的成果。

## 金砖国家金融实力亟待提升

从美国投行提出的一个“BRIC”投资概念,到各成员国之间经贸往来、金融联系不断增强,并且吸收新鲜力量壮大形成“BRICS”的经济合作机制,金砖国家近些年来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以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截至2013年末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占比比较两年前上升1.3个百分点至27.6%,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1.4倍。金砖国家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要力量。据IMF预测,2014至2019年金砖五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复合增长率为7.9%,按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1.3%。

虽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地位提升有限。从股市市值指标来看,截至今年7月15日,金砖国家股市在全球股市总市值中的占比不升反降,由2011年初的15.1%下降至11.9%。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对金砖国家造成的明显冲击,进一步表明金砖

国家的金融实力亟待提升。2013年,受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预期不断增强影响,跨境资金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多数金砖国家货币迅速贬值,金融市场遭到严重冲击。其中,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对美元分别贬值15.1%、12.4%、7.7%。今年上半年,跨境资金开始显露出回流新兴市场的迹象,金砖国家也赢得了喘息之机,但随着美联储今年10月份可能结束量宽购债,明年加息步伐可能提前,金砖国家或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因此,金砖国家唯有进一步加强合作,以整体的力量与经济金融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竞争,才能在形势错综复杂、风险暗潮涌动的后危机时代站稳脚跟,巩固经济发展成果,提升在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

## 合作共赢是金砖国家唯一出路

不同于统一货币制度下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类似“邦联制度”关系,金砖国家之间实质上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在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等方面缺乏有力的联系机制和纽带,这也是看空金砖国家的投行经济学家主要的论据所在。应当承认,金砖国家所在地域跨越了亚洲、欧洲、南美和非洲,并且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性的确较大,但从经济生产的角度看,这5个国家之间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比如,中国、印度是能源、原料消费大国;俄罗斯则是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生产国,巴西是咖啡、大豆等生产原料全球主要出口国;南非等国对外部资金需求较大,而中国正在跻身主要净对外投资国行列。从全球产业链看,虽然金砖国家主要处在中低端环节,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不断壮大,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

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金砖国家的发展前景面临不确定性。例如中国与印度均是能源消费大国,过去在国际市场上争夺能源供应的竞争时有发生,同时中印又都是制造业出口大国,尤其在IT产品方面竞争激烈。在组建金砖银行的讨论中,中印又曾在设立地点问题上展开竞争。但需要强调的是,金砖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并不意味着只能互为对手。事实上,公平、平等的合作最终会给五国带来共赢。2005年中印联手竞购叙利亚石油资产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最新签署的合作协议,将上海设为金砖银行的总部,首任行长、理事会主席、董事会主席则分别来自印度、俄罗斯、巴西,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这既是各成员国竞争角力的结果,也是相互让步、达成合作共识的成果,体现了金砖国家之间公平的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世界银行与IMF等主要国际组织为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提升话语权的改革呼声迟迟未能得到响应,金砖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兴市场“另起炉灶”的战略决策。虽然在金砖银行设立过程中,已多次被视为对两大国际组织的直接挑战,但也应看到其与世行、IMF存在的巨大差距。要想改变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金砖银行的设立只是一个开始。对于金砖国家以及广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开展更广泛的经济金融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工城市金融研究所)

# 经济存下行压力 政策应维持宽松

王宇鹏

我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比一季度回升0.1个百分点;6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5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比1-5月份高0.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都表明经济有企稳回升的迹象,一些机构开始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抱乐观态度。笔者认为,下半年经济仍有下行压力,政策应维持宽松,刺激力度甚至应该有所加大。

## 从需求端看 复苏根基不牢

从“三驾马车”来看,中国经济缺乏持续的上升动力机制。

第一,看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三大类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三,从三大类投资的增速就可以判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三大类投资中,只有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企稳回升。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制造业持续复苏的空间有限。房地产的供需矛盾会使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未来1-2年内延续下跌趋势。房地产市场将持续低迷。随着中国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和饱和,未来基建投资的空间非常有限,难以实现持续增长。

第二,从消费来看,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4%,比5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未能延续5月份的上升行情。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收入是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没有对消费采取大的刺激措施,在经济走弱的背景下,消费自身很难走出独立的上升行情,也很难成为引领经济上升的动力。

第三,从出口来看,1-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0.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0.4%,全年很难实现7.5%的增长目标;贸易顺差累计额为1028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55亿美元。预计三至四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负值,也就是说,会拉动经济增速,不会给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 从货币政策看 利率传导受阻

从货币政策来看,银行贷款利率未有实质性下降,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宽松并未传递到实体经济。6月末,广义货币(M<sub>2</sub>)余额120.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末高1.3个和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sub>1</sub>)余额34.15万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月末高3.2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大幅回升;201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4146亿元,这些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在提高。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带来了银行间市场的相对宽松,3月份以来,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维持2.5%左右波动。但是,银行间市场的宽松和货币供应量的回升并未带来实体经济资金利率的显著下降。2014年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然维持在7%以上。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不论是短期需求端,还是长期供给端,目前中国尚缺乏经济持续加速的动力机制,仍有下行压力。在物价低水平运行的背景下,政策有可能也有必要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我们建议,在财政政策空间有限的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央行下半年应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和降准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行,甚至采用降息的方式来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 从财政政策看 未来空间有限

1-6月份,公共财政支出同

比增长15.8%,高于去年同期5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是二季度经济回升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甚至是以牺牲下半年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代价的。首先,从财政支出的决策机制来看,全年的公共支出很大程度上受财政预算的约束,并不是想投资多少就投资多少;其次,从财政支出的预算约束来看,财政支出受到财政收入的限制,财政赤字规模在年初就决定了;最后,从作用机理来看,目前公共财政支出主要投向民生等领域,这些投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回报慢,在短期内很难发生化学反应。从这三方面来看,下半年公共财政支出延续高速增长将不可能。

## 从供给端看 潜在增长率将下行

从供给端来看,根据生产函数Y=AF(K,L),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由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共同决定。首先,从TFP来看,我们测算了1978至2012年的TFP,三次大的改革都激发经济增长活力,TFP在改革后一段时间内都达到峰值。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南巡讲话”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改革红利是TFP增长较快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红利带来的边际贡献将会越来越小,TFP必然会下降。

其次,从劳动力来看,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到2015年左右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将在达到巅峰之后回落,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老龄化浪潮的提前到来。未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进一步下降,甚至接近于零。

最后,从资本来看,随着人口抚养比的提高,社会储蓄率将进一步下降,社会用于投资的钱将减少,资本增长率将会下降。从一季度GDP构成来看,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4.9%,已经超过了投资。随着消费率的提高,未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肯定会下降。

# 财政账本“其他类”的神秘面纱应该揭开

江德斌

翻开全国财政收支账本,“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等“其他类”随处可见。在去年的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其他支出”竟高达1.3万亿元。除了总额巨大,其所占属项的比重也不小。比如去年18678亿元的非税收入构成中,“其他收入”高达8716亿元,占比接近一半;而在去年的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表中,节能环保支出下面的“其他支出”占比更是高达95%。专家表示“其他类”金额过高、占比过大是预算管理极不透明的表现。

从财政收支账本的数据来看,“其他类”已然成为了一个口袋项目类别,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款项收支,都被打包悄悄塞进去了,外人很难知晓这些“其他类”里面都有些啥东西。而且,从“其他类”在整个财政收支所占比例来看,明显过大,不符合合理。如果按照账目明细化原则的话,“其他类”只是一个附属项目,那些非常规收支才会被纳入,占比应该是最小的部分。

近些年来,财政收支账目和预决算都在逐步透明化,各款项也逐渐细化,但从公开的数据来看,仍然存在账目太过简陋、细化程度不够彻底、水分太大等问题,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很难看

懂各级财政账本。显然,正是由于这些细节没做好,留下的漏洞太多,各级财政才会利用机会,将“其他类”做大,把各种猫腻藏在里面。

因此,从财政账目透明化、明细化的改革方向出发,必需揭开“其他类”的神秘面纱,将掩藏在其下的内容晒出来,逐一仔细审核,看哪些符合财政制度,哪些属于违规收支项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完善财政账目的管理制度,把各项收支分类科目做细,每一笔收支都要记入相应类别,且明细到能够追根溯源。比如香港政府的财政账目,细化到一张纸、一把椅子,都可以在账目里面反应出来,市民都能看得明明白白,随时都可以查询,在如此高的透明度下,秘密也就无法掩藏了。

可见,神秘的“其他类”乃是有意为之,各级政府部门缺乏财政透明化的动力,毕竟透明化要触动他们的切身利益,使得那些不符合规定收支项目,再也无法遮掩,不合理的收费、违规公款消费都将无所遁形。因此,要想将财政账目透明化,不仅要账目细化,还要严格落实责任,对违反统计原则弄虚作假、违反财政管理规定收支的行为,要依法予以严惩。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理应依法严格收支,让民众能够清楚了解钱怎么来的,都花到哪儿去了。

# 缓解劳动力价格上升压力需综合施策

井水明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6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418万人,同比增加307万人,增长1.8%。月收入2733元,增长10.3%。这是自2009年以来,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价格连续第6年保持增长,平均增幅达13%以上。

农民收入水平又涨一层,可喜可贺。一方面预示着农民工的劳动价值正在得到市场的认可,正改善和提高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和生活质量,让处于低收入岗位的农民工能在收入上有一个稳定的增长。另一方面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微企业来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给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带来的压力显而易见。虽说业界普遍认为破解之道无外乎是通过

投资研发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以保持住被不断挤压的利润率,但是,对于那些既无科研力量又无投资能力的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而言,此法显然行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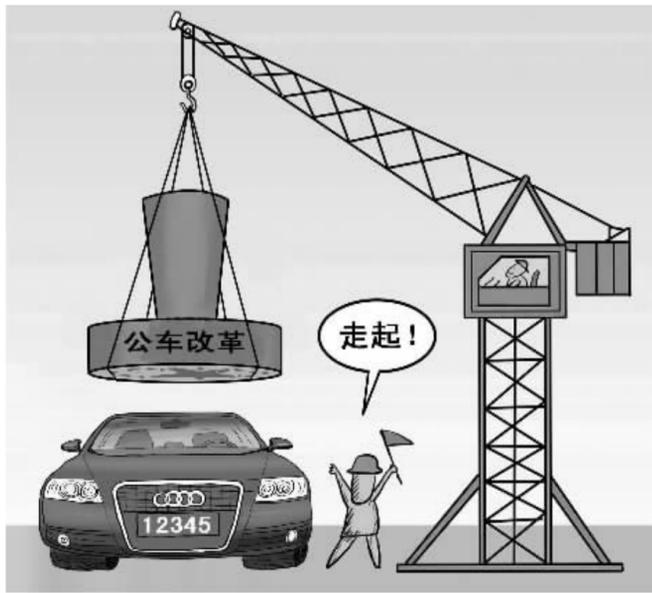
现在,中小微企业占了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GDP的58.5%,实现利税占50.2%,对国家贡献非常巨大。面广量大且生产经营效率不高的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受到来自市场竞争激烈的挑战和自身创新、盈利能力不强的限制,近年来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导致中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更加雪上加霜,如何在劳动者收入年年稳步提升的同时也让中小微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至于上涨得过快,进而直接影响和威胁到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是政府应当考虑的问题。

中小微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提供的就业岗位占了75%。中小微企业必须年年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标准,以满足农民工收入年年增加的需要,势必会带动企业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中小微企业能够把生产经营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降下来的唯一出路或许就是减少职工数或增加加班,并把那些老弱病的员工推出去,以减缓劳动力成本上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成本压力。随着企业裁员的发生,势必直截了当地影响到农民工生活的安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所以,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政策性的扶持方法来确保农民工就业率的基本稳定,对于吸纳一定规模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在上交五险一金的费用上给予大幅度的减免,确保小微企业能有比较宽松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以提高中

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分配性和主动性。中小微企业年年遭遇“用工荒”,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太高,阻碍了农民工留在城市寻求发展的动力。而农民工“候鸟式”的流动方式,造成了中小微企业在用工上无法构建一支稳定的员工队伍。而要改变此种现状,政府应当在农民工进城入户上提供更多福利待遇,确保农民工能够“安居乐业”。

面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价格,政府要综合施策,拿出从中小微企业那里收上来的“真金白银”还利于中小微企业,通过优化农民工进城入户的福利政策,让中小微企业不要因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而陷入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的困境,从而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和中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

## 公车改革正式启动



公车改革再启动,民众观望气氛浓。类似改革多次搞,实际效果多落空。红头文件能造势,人大法律更管用。审美疲劳莫再演,治车先让权入笼。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